

西南民族研究

苗瑶族研究专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K280.7

5

283

西南民族研究

(苗、瑶族研究专集)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贵阳

责任编辑 周国茂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西南民族研究

(苗、瑶族研究专集)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州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字数:230千

1988年12月贵阳第1版 1988年12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412-0046-8/K·5 定价: 3.50元

序 言

王 朝 文

1987年9月20日至24日，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委、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共同主持在贵阳召开了“中国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这本论文集。与会的专家学者，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文学、史学等各门学科，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这将对苗族瑶族地区两个文明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有益的影响。

苗族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在国外，苗、瑶族还分布在东南亚、欧、美洲和大洋洲。苗、瑶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苗、瑶民族大多居住在我国西南偏僻的山区。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使得苗、瑶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状态。解放以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苗、瑶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解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和开放，冲破了过去僵化的经济体制，苗、瑶广大群众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得苗瑶地区的民族经济日益活跃起来，在原来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苗瑶地区的民族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苗瑶地区开始脱贫致富；还有一些苗瑶地区正在摆脱贫困。

和全国相比，苗、瑶族地区的经济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实际上，苗瑶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智慧的苗瑶族人民。经济的发展潜力很大，有待于对苗瑶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开发和智力开发。要使苗瑶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最主要的是必须按照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搞好改革和开放，使商品经济在苗瑶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从各个学科，加强对苗瑶民族地区各个方面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不断作出振兴苗瑶地区民族经济的各项科研成果，运用各方面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大力支持苗瑶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更好地为繁荣苗瑶民族地区的经济，进一步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苗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是苗瑶民族的迫切要求，也是整个四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苗瑶民族的繁荣昌盛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努力。首先最重要的是发展苗瑶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广大的苗、瑶族人民正以空前的积极性发展商品经济，提高文化和科技知识水平。在这过程中，苗瑶地区迫切需要经济开

发和智力开发，加强科技投入和文化教育。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苗瑶地区的经济和科技扶贫；一方面要启动苗瑶人民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素质。“扶贫先扶志”，加强“造血”功能尤为重要。把经济、科学技术的投入与苗瑶族人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再结合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会加快苗瑶地区四化建设的步伐，逐步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宏伟目标。

目 录

- 序言 王朝文 (1)
苗族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向 零 龙伯亚 (1)
苗瑶族古代史叙略 龙 中 (22)
怎样认识苗族的盘瓠崇拜 龙伯亚 (46)
荆蛮楚人与苗族 伍新福 (71)
《苗族史诗》词汇探古 今 旦 (90)
历代王朝对苗族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陈天俊 (98)
苗族对丰富祖国文化宝库的贡献 胡启望 韦荣慧 (119)
论苗族文化的群体特征 韦启光 (133)
黔东南苗族节日简论 潘定智 (150)
论盘瓠的时代特征及其与苗族的关系 吴荣臻 杨正文 (165)
海南岛苗族 李明天 (180)
苗族妇女传统服饰制作改革刍议 杨通儒 (183)

瑶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韩肇明 (199)
广西瑶族地区发展民族经济的探讨 张声震 (208)
瑶族历史三题 容观琼 (220)
中泰瑶族文化比较 姚舜安 (231)
论白裤瑶的“油锅” 王昭武 (244)

- 也谈瑶族“千家洞” 黄钰 李本高(259)
论《瑶族风情歌》 兰克宽(268)
瑶族支系文化特点差异之我见 王时阶(282)
对贵州青瑶婚俗改革的思考 盘伟岸(297)
瑶族传统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覃茂福(309)
- 从稻作看苗、瑶文化 佐佐木高明(326)
对民族村寨文化的探讨 福田细亚郎(330)
苗瑶萨满活动初探 雅克·勒穆瓦纳(334)

苗族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向 零 龙伯亚

我们这次会议，是讨论苗族瑶族的学术会议。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有关领导和同志已经讲过了。现在我受大会的委托，向大家汇报一下苗族研究情况。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多发表意见，把今后的苗族研究，特别是社会历史研究和四化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找出方向。我的汇报主要讲三个问题：一，苗族研究史简述；二，近几年苗族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三，今后苗族研究的展望。

一、苗族研究史简述

(一) 明清时期的研究

历史上有关苗族的记载颇多。先秦时期许多关于南蛮的记载。秦汉至两宋关于蛮夷的记载。都包括有苗族的先民。这

* 这篇文章是向零同志代表西南民族学会在西南民族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苗瑶民族社会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的报告。文章由向零同志提出构思和设想；由龙伯亚、岑秀文、鲜松奎、杨昌文四同志提供有关资料，最后由龙伯亚同志执笔综合写成。

些记载除记述苗族反抗斗争较多外，其余大都很简略。认真说来，这些记载除了给人们提供一些粗枝大叶的印象以外，还谈不上对苗族有什么研究。

元明清时期，由于我国中央封建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大西南，对苗族的研究和了解更进了一步，随之而出现了许多记述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情况的官私著作，不下百余种。其中部头较大的如明代郭子章的《黔记》(共20余卷)，清代的《钦定平苗纪略》(52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以及严如煜的《苗防备览》、《苗疆屯防实录》、但湘良的《湖南苗防屯政考》等。这些记载。认真说来仍然说不上是科学的民族研究。其特点：一是没有把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区别开来，往往混同一体，而真正属于苗族情况的，也是耳闻传说居多，互相抄袭的多，粗枝大叶的更多，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少，系统调查了解有定量分析的更少，所以数千年来的苗族历史面目仍然模糊不清。二是立场反动，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以封建的大民族主义观点，来咒骂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嘲笑他们的风俗习惯，辱侮其民族感情。有些大部头著作虽也对苗族作过认真的研究，如《苗防备览》和《平苗纪略》等，但内容主要是研讨征服、镇压、统治、分化苗族人民的方法和策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服务。他们研究越深入越具体，苗族的灾难也就越深重。这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着详述了。

(二) 民国时期的苗族研究

1840年后，虽然有些外国传教士利用西方近代的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观点，到苗族地区进行调查，写了一些著述，如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写的《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

民》(1861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1894年写的《中国西部的苗子和其他部落》,日本民族学者鸟居龙藏1903年写的《苗族调查报告》等,给苗族研究注入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新的意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除鸟居龙藏影响较大外,其余多数都很皮毛,而且牵强附会也多,有不少论著还同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因此在国内学术界影响甚微。

国内真正开始运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观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的,还是民国时期。苗族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部分地摆脱了旧的封建传统思想而有了一定的起色。这些学者既具有中国史学知识和求实考据传统,又有新的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知识,而且更注意实际调查,从而使苗族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时期,我国学者运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苗族社会情况的逐渐增多。1928年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内设立了民族学组,对国内少数民族开始进行研究,并于1933年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调查,其后写成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国内学者对一个苗族地区调查后写的第一本大部头著作。1937年广州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联合组成考察团,调查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其后由调查者王兴瑞写成了《海南岛之苗人》一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海南岛的苗族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相继迁入了大西南,使很多学者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直接研究苗族。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求得抗战后方的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过对西南各族的研究,这也有助于苗族研究的开展。当时研究苗族社会情况的,在贵州有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吴定良及德国女学者包克兰,研究四川苗族

的有胡庆钧和美国学者葛维汉，研究云南苗族的有岑家梧等。研究湘西苗族的主要有芮逸夫，研究海南苗族的仍是王兴瑞。他们通过调查，都写了多种调查报告和文章。其中以吴泽霖、陈国钧的影响较大。当时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通过调查，就编写了不少有关苗族情况在内的《乡土教材》。他们多次到安顺、定番、炉山等地调查苗族情况，搜集了许多苗族民俗资料。以后，他们还多次到黔西南、黔南、黔东南和广西融县、罗城、三江等县调查各族情况，并以调查苗族为重点，写出了多种调查报告。据不完全了解，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写的苗族论文报告不下百篇，报上发表的通讯报导亦有数十篇，总计约150余篇。另外，还有乡土教材10余种。这些文章的主要部分1983年已由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等同志汇集成《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入该所的《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0集》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研究苗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苗族学者，他们是梁聚五、石启贵、杨汉先、杨约翰等。梁聚五是贵州雷山县人，以研究贵州苗族为主。其主要著作是《苗夷民族发展史》。该书从政治角度全面介绍了苗族的历史，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相当参考价值。其不足之处，在今天看来主要是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与苗族混同，甚至当作苗族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是当时学者一般的通病，不足为奇。他在解放后仍很关心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政事之余还写了一些苗族历史论文，1978年病逝。石启贵是湖南乾城县（今吉首市）人，专门研究湘西苗族，其著作现已由中央民族学院徐仁瑶、石建中等同志整理编成《湘西苗族实地考察报告》一书，于1986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近50万字，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实际上是一本解放前的湘西苗族志。石启贵解放后1959年逝世。杨汉先是贵州威宁县人，在这时期写了多篇有关黔西北苗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解放后在政务之余，仍继续从事黔西北苗族社会历史研究工作。杨约翰是贵州威宁县人。是川、滇、黔苗语方言老苗文的创制者之一。

这时期苗族研究的主要成就是：（一）、通过这些学者们的调查、研究、报导，使苗族在国际上广泛地为人所知（当然其中也有外国学者和传教士的劳绩）。（二）、扩大了苗族研究的领域。其中包括历史、经济生活、语言文字、节日、歌舞、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等，在此基础上，收集了一部分资料。他们在运用新学科研究苗族方面起到了启蒙作用、先驱作用。（三）、研究上有一些新意。如语言研究，图腾和氏族研究。有的把历代“苗乱”称为起义。有的文章包含有实行民族平等意识，等等。这在当时来说都是新鲜的，和封建文人大有区别，其进步因素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这些研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一）是内容涉及面广，但不够深刻，泛泛而谈者多。据我们统计的145篇报导和论文中，属于介绍概况的就有43篇。内容上也多偏重于生活习惯介绍。这方面又占了45篇。属于社会历史的有30多篇，其中族源又占了 $1/3$ 。其它仅20来篇。（二）是仍然把苗族同其他民族混同，这就大大地冲淡了它们的科学性；（三）不少学者虽对苗族被压迫地位有所同情，但也有些人仍然把苗族历史上的斗争一概称为“苗乱”，有的还继续宣扬旧的民族同化观点。等等。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贫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苗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给我国的民族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民族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逐步开展起来了。苗族研究被党和国家列为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的到中南和西南各省民族地区访问的民族访问团先后到苗族地区访问，是新时期苗族研究的开始。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西南分团，在宣传民族政策、帮助各地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同时，还调查收集了许多民族情况，并将访问观感，写成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向国内外人民作了介绍，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苗族的情况。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务院指示，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民族语文系，开办了苗语班，为苗语的普查和创制新苗文培养人才。在马学良、王辅世两教授具体领导下，苗语研究队伍迅速成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以这支苗语研究队伍为骨干，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和贵州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合作，对苗语进行全面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新苗文。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调查队完成任务后，苗语的研究和苗文的试点推行工作，主要在贵州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与此同时，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主持下，成立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湖南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贵州苗族为重点，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这个调查组工作结束后，1958年8月，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主持，以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为骨干，调集了若干大专院校师生和地方干部参加，组成了“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编写苗、侗、布依、水、仡佬等民族的简史和简志。这两个调查组，在苗族研究方面除有不少苗族和其他民族同志参加外，还有吴泽霖、岑家梧、王静如、侯哲安等教授先后参加了工作，并从这里培养了最初的一批苗族研究骨干，收集到两百多万字的苗族资料。1963年，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完成工作任务后，苗族社会历史研究工作，主要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进行。当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的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广东等省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民族研究机构，也对苗族社会历史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在民间文学方面，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贵州省文联和省民委即调集了一批汉族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逐步收集整理各族民间文学资料，并开始编写《苗族文学史》（初稿），从这里培养了最初一批苗族文学创作研究人才。总之这时期的苗族研究虽然还只是开始，但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1958年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使研究工作和方法出现了某些偏差，但整个工作还是继续向前发展。可惜这个良好的学术研究局面，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克服和终止了极左思潮的干扰，端正了党的各项工作路线。民族研究从此获得了新生，许多研究机构恢复了，扩大了，思想解放了。苗族研究工作又重新迈步向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开始出现了百家争雄、百花争艳局面。首先，是研究范围更加广阔了。50年代到60年代初，苗族研究主要是在社会历史、文

学、语文三个领域上进行，其它领域仅是调查了一些资料，但研究不多。现在除上述三个领域外，还扩展到文化领域，如哲学思想、艺术歌舞、服饰、居处、节日、婚姻、丧葬、宗教、经济、教育的研究，就是历史、文学、语言领域的研究内容也在扩展和深化。

其次是研究队伍扩大了。这支队伍，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而业余的比专业的更多。水平也比50、60年代时高得多。其中还有大量的苗族学者，这是解放前不可想象的。这支队伍，有史学、民族学方面的，有语文方面的，也有文学方面的。值得一提的是苗族在研究热潮中，还涌现出一批关心苗族研究并且自己也能写能领导学术研究的苗族干部，如湖南龙再宇、广西梁彬等。

第三，是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专著方面，除文学创作不计外，各类著述已出版了多种。其中王辅世编的《苗族语言志》，龙伯亚、施培中主编的《苗族简史》，田兵、刚仁、施培中编的《苗族文学史》，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各自标志着其所研究的领域已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1986年出版的吴荣臻同志写的《乾嘉苗民起义史稿》，也受到了好评。论文方面：从1978年起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各类研究苗族的文章已达250余篇，超过解放前和解放初50、60年代的总和，理论水平也比以前高。资料的收集整理成绩也很大：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已出版了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整理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册，约150多万字，还铅印了近几年来实地调查的《贵州民族调查》资料4册，其中苗族的很多。云南和湖南也出版或内部印发了苗族社会历史资料。此外，在各省、市、州、县刊印的《文史资料》中，收

集的苗族资料数量也很可观。民间文学方面：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已出版苗族民间文学资料34集、民间文学丛书8集，各省、自治州、自治县出版的这类资料和丛书也不少。

第四，扩大苗族研究的社会影响。通过各省市有关部门的工作和学者们的调查研究、讲学和出书、出资料等活动，苗族研究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注意，特别是苗族干部和群众的关注日益强烈。在苗族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志于研究本民族的日益增多，爱国、爱本民族的激情在增长。这就证明党和国家的民族研究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苗族研究的成果和信息，随着党的开放政策的实施传到了海外，也引起国外同行学者的关心。近几年来，相继有十几批国外学者来到苗族地区考察，同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其中包括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梅卓忠夫等人。通过学术交流，既扩大了苗族研究的影响，也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增进了互相间的友谊。

以上，就是近几年来苗族研究的主要情况。

二、近几年苗族研究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

如上所述，这几年苗族研究涉及面很广，讨论的问题也很多。这表明苗族研究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我们大家都为之感到振奋，受到鼓舞。对这几年这样广泛的研究内容，我们不可能一一俱述，仅能就其几个主要方面，向大家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一）社会历史研究

首先是出版了《苗族简史》编写组编，由龙伯亚、施培中